

文第士——教師及文化人

António Aresta *

文第士(曼奴埃爾·達·席爾雅·門德斯)是澳門當代葡人知識分子的最傑出代表人物之一。

不可能將他從不懈的公民及政治參與，道家思想、中國宗教和藝術的研究和傳播，甚至，從他本人置身其中的偉大教育事業內分割出來。

這樣，就讓我們追蹤他生活的軌跡。

從求學年代至自由社會主義(Socialismo Libertário)

葡萄牙自19世紀下半葉至共和國年代處於動盪不安之中。這是一個轉變的年代，其標誌是在文學、藝術、意識形態、經濟或觀念的領域裏留下各種認識論的裂痕。觀念之路構成了一個三叉路口：1852年這代人，如阿莫林·維亞納(Amorim Viana)及蒲魯東(Proudhon)對經濟矛盾的分析；1870年這代人具有美學、意識形態及哲學的多元主義；追隨利特雷(Littré)學派觀點的實證主義學說。註釋學派中，有百科全書學派的沈拜奧·布魯諾(Sampaio Bruno)和浪漫地迷失於現實主義的卡米洛·卡斯特洛·布蘭科(Camilo Castelo Branco)。

用格拉·戎克羅(Guerra Junqueiro)的話來說，1891年1月31日的共和革命標誌著一種針對與最清醒的集體意志不協調的政治體系的全國性不順從主義(Inconformismo nacional)的開始。因此，主要在藝術、意識形態及文學方面產生了與權力分離的認識決裂，需要為既具爭議性又令人不安的認知創造空間，以便管理一個新的權力，一個象徵性的權力。

* 教授兼研究員

安德羅·德·肯塔爾(Antero Quintal)亦在1891年自殺，這十分說明問題，因為生命悲劇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無法樹立象徵權。對此佛教的神秘¹可能給予了格外的激勵。

安德羅寫到：‘我們是共和派，因為如果我們不明白只有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共和國，同樣地我們也不會明白只有通過共和國，社會主義才可以完全實現’²，這樣，有必要如同一宣言一般，突出一些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我們不要求你們給我們社會主義，只請你們在共和國裏為社會主義綱要、為社會主義的舉措、為社會主義改革給予一席之地，我們將與你們同心同德，因為你們將給予我們的是我們可公正地向你們要求的、是社會主義可公正地向共和國要求的”³。

無埃薩·德·克羅斯(Eça de Queiroz)的辛辣分析，世紀之末的意識形態描寫的不完整是不可避免的。這尤其表現在1871年他捍衛若澤·法爾康(José Falcão)的那些話語中：“陛下的政府清楚知道，在葡萄牙沒有共和黨、社會黨或陰謀家；完全知道沒有俱樂部、沒有共產國際分子、秘密會社、傳授社會主義的作家、討論社會主義的報章或實現它的武器。然而！政府在葡萄牙捏造了社會主義，正如第二帝國在巴黎捏造了陰謀。政府泡製了“紅色”幽靈，以便有幸與其較量。共和國在葡萄牙只不過是一個政治的陰謀。這在葡萄牙是人所皆知的事實，三、四位思想家現時未願意離開他們書本內的安寧。這便是葡萄牙的社會主義！”⁴。

1891-1892學年，文第士正在科英布拉大學攻讀法律一年級的課程。科英布拉是知識幅射的源頭，其特性在葡國⁵獨一無二。詩人歐熱紐·德·卡斯特羅(Eugénio de Castro)播下具有寓意的象徵主義種子，而俱樂部會議的餘潮常常引發思想討論。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思想似乎未脫埃萊阿的芝諾(Zenão de Eleia)的悖論的巢穴。

1. 若瑟·阿爾韋斯，《安德羅·德·肯塔爾，致命的矛盾》，高秉根基金會，巴黎，1982年，第277頁。

2. 《社會——政治散文集》，官印局-鑄幣局，1982年，第391頁。

3. 若昂·梅迪納，《俱樂部會議和社會主義在葡萄牙(文選)》，唐吉訶德出版社，1984年，第204頁。

4. 同上，第272頁。

5. 科英布拉大學是歐洲最古老及具威望的大學之一，成立於1290年3月1日。近況見《大學歷史大會論文集：科英布拉大學七百年》，5冊，1991年。

對文第士來說，科英布拉年代從任何方面過來說都是決定性的。的確，這個北方青年來到了科英布拉，一個堅定地表明繼理性年代而來的是抗議年代的大學城。1月31日的首次推翻君主制度的大規模企圖是這些抗議在波爾圖的爆發。

他眾多的導師中有：著名的“人生失意者”小組的最隱秘成員，實證主義泰斗和被公認為19世紀最勇猛的議會辯士的安托尼奧·坎迪多(Dr. António de Cândido)；詼諧人物阿韋利諾·卡利斯圖(Dr. Avelino Callisto)，他常常是特林達德·科埃柳(Trindade Coelho)或拉馬柳·奧爾蒂岡(Ramalho Ortigão)的幽默諷刺的對象；將國際法引入法學院的王國上議院議員若澤·弗雷德里庫·拉蘭儒(José Frederico Laranjo)；後來從1904年至1908年國王遇刺時擔任王子唐·盧伊斯·菲利佩(D. Luís Filipe)和唐·曼奴埃爾(D. Manuel)哲學老師的洛佩斯·帕拉薩(Dr. Lopes Praça)。

正是這最後一位民法教授洛佩斯·帕拉薩對年青的文第士產生了潛移默化，但強而有力的影響。

1868年洛佩斯·帕拉薩發表了葡萄牙首部《哲學史》。該作品有現代重印本多種。

可以發現上引作品和文第士所著的自由社會主義史在章節與理論建構上格外相似。如果說洛佩斯·帕拉薩在其哲學史中尋求一種闡述的平衡，偶然流露出一些不可掩飾的克勞澤主義的東西，文第士則欲更高一籌，在其史家的工作中採取超越絕對中立的態度。這種中立的態度在對一些自由社會主義的主要歷史流派的熱情剖析中崩潰了。

1896年，文第士完成法律業士課程(bacharelado)，獲得學術表彰。

同年出版了他的專文《自由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歷史與學說》。這遠遠不是一篇簡單的學術論文，而是一部先驅性的開山之作。古往今來，它仍是葡萄牙第一和唯一的自由社會主義的通史。這至少是一奇特的現象。

還值得一提的是，仍然是在1896年，在科英布拉的《學院(O Instituto)》雜誌上出現了一篇最早研究佛教的論文，對瓦斯孔塞盧斯·阿布雷烏(Vasconcellos Abreu)所著《佛教中的現象性、靈魂和我》的評論。同時，頒布了嚴厲的反無政府主義法。

文第士的著作《自由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歷史與學說》實際上是自由意志及無政府主義思想運動的通史，尋求通過所有大思想家俯首即拾的矛盾言論突出它，強調歷史的哲學性。我們可以將它等同於尼采(Nietzsche)對哥德(Goethe)及黑格爾(Hegel)關於時代精神和現時即永恒的分析。

文第士的參考書目豐富⁶，因此我們可以判斷史料的新舊及其多元性，和他必須進行的梳理和總結的努力。

作品分為十章，即：先驅人物；馬克思及至1873的國際勞動者聯合會；巴枯寧和無政府主義運動；1876年至今的無政府主義理論運動；事實勝於雄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演變；社會主義歷史理論；經濟演變；論共產主義社會；政治演變。

文第士的企圖是：“填補存在於我們的文獻中的一個空白是本書的目的。……在我們之中，除了顧問塞爾帕·皮門特爾(Serpa Pimentel)先生的一本小冊子和一些略有涉及的刊物外，沒有本問題的論著；所以，學者只能從外間的書本涉獵這一社會主義思潮的想法⁷，並自我定位為一中立的史家，綜合觀察思想史的歷程，戒絕在任何地方流露表示排斥或贊同的強烈語氣”。文中並指出：“在本書的撰寫中，我們從頭到尾不擬發表己見。我們不應發表意見，因為我們的目的只在完完全全地介紹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和學說。……似乎我們處處都奉行我們的言論。但請不要這樣判斷，這令人生畏。這是闡述的方式，有時是從這流派中選出分歧意見的方式。本書無辯護、無勸告、無贊揚、亦無煽動，只是一本陳述事實的書。因為誰想單純陳述一些事實，必須不涉及於任何論題之中。”⁸

同時他又尋求解除一些踐踏自由社會主義形象的虛假判斷：“此外，無人因為是無政府主義者而黯淡失色，現代的一些偉大人物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克魯泡特金(Kropotkine)、埃利澤·雷克呂

6. 例如：安德烈·利清波爾戈(André Lichtenberger)，《18世紀的社會主義》，巴黎，1895年；麥克·得拉貢莫諾夫(Michel Dragomonov)，《巴多尼尼通訊錄》，巴黎，1896年；思賓塞(H. Spencer)，《個人與國家》，巴黎，1888年；馬克思，《資本論》，無出版日期；阿道爾夫·波薩達(Adolfo Posada)，《社會學與無政府主義》，巴黎，1894年。

7. 《自由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歷史和學說》，科英布拉，1896年，第XI頁。

1196 8. 同上，第XIII頁。

(Elisée Reclus)、托爾斯泰(Tolstoi)、伊布森(Ibsen)，此等人均是大社會學家、偉大的自由傳播者、大地理學家、偉大基督徒、大劇作家⁹，是他根據哥德的評價舉出這般傑出的人物來作的例子。沒有甚麼比推論邏輯的結果更無推論的東西了，因為它所生產和製造的恰恰是最不自然的，因而有必要在逝去的古老歲月裏尋找失落的根源。

文第士步其他史家和思想家的後塵，深信自由社會主義或曰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根源可在中國，確切地說在老子的《道德經》中尋得：“公元前600年，老子思索著人類的命運而寫下了80篇闡述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文章，與埃利澤·雷克呂及克魯泡特金王子今天的闡述的不謀而合。……總而言之，反叛精神藉着蒙古人的媒介由亞洲傳來歐洲，由馬茲德克(Mazdec)到巴枯寧；源自蒙古人的無政府主義傳給了雅利安人，因為一切來自亞洲，無論好壞：聖經、科學、自由、哲學和霍亂”¹⁰。

幾年後，當他埋首研究道學時，將有力的印度理論貢獻，特別是印度教的奧義書流派作為瞭解道教特定教義的基本參照。提出：“必須駁斥惡意或無知作者廣為傳播的思想，即無政府主義只不過是古代社會主義烏托邦的複製品，正如柏拉圖(Platão)、摩魯士(Morus)、康帕內拉(Campanella)或傅利葉(Fourier)等人構想的社會體系，有如劇作家的戲劇場景，一切都是預先排練以產生預計的效果”¹¹。

要喚起人們認識哲學比較研究的價值，一種與文明的比較研究有同樣的價值，就可視文第士為此領域的先驅人物。

在他看來，無政府主義不是突然及人工的產物，而是以往眾多文化競爭而產生的邏輯衍生物。這些競爭被新的社會條件改造和強化，表現成為一種會在將來完全實現的確定的社會趨勢。同時被確立成為人類的一種義務和公義，為建立一個所有人在社會共處中能自由活動的社會制度而鬥爭¹²。

自18世紀始，自由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開始由知識轉向權力，特別由於盧梭(Rousseau)、內克(Necker)及馬布利(Bably)的影響。在他的筆

9. 同上，第XIII頁。

10. 同上，第3頁。

11. 同上，第7頁。

12. 同上，第8頁。

下，蒲魯東最優先：“對於我們而言，他的功勞在於他澄清一些被蒙上了一層或多或少具有情感神秘色彩的社會主義觀點。他大膽坦率談論宗教及政治問題，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和無政府義者，論斷馬克思、恩格斯(Engels)和拉薩爾(Lassale)是科學社會主義概念上的最早的專制社會主義者，而蒲魯東、巴枯寧、吉榮(Guillaume)則是最先的自由社會主義者”¹³。

在這本自由社會主義的通史中亦有論及葡萄牙：“在葡萄牙，無政府主義運動未與其他國家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同步。最早按照巴枯寧聯盟的章程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具有不同的發展傾向；但今天由於一些一直生活在葡萄牙革命家之中的西班牙工人的影響教育，社會主義一般傾向無政府主義的形式。里斯本、波爾圖、科英布拉及其他工業中心的工人階級將日漸摒棄馬克思主義的傾向而投向無政府主義。工人階級深信議會策略徒勞無功，拒絕接受專制社會主義。在主要的社團中心裏，有許多秘密或半秘密的小組。其中一些小組無約束地宣傳此事，另一些則遵守一定的規則。因里斯本謀殺事件而引發政府於今年2月頒佈一項法律的原故，如今他們的報紙都是地下的。因同樣的原因，所有小組的組織也是秘密的”¹⁴。

作為黑格爾的忠實信徒，文第士從骨子裏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如同後來克羅齊(Croce)在1907年說的那樣，他受益於黑格爾哲學的活躍部分，即客觀精神科學，但未敢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

除了這種精神上的遨遊外，文第士亦是為了在葡萄牙建立共和制度而努力不懈的鬥士：“那時，我的確是共和派黨徒。在索薩·費爾南德斯(Souza Fernandez)的《未來報》上攻擊可恨的君主制和保王黨人。……在三個主編中，我在公眾眼裏是最紅的。而我的政敵更進一步，為了破壞我和大家閨秀的婚事，指控我是無政府主義者……危險，太危險了……還是無神論者！”¹⁵。

但一次命運的偶然機會完全改變了他的人生。

13. 同上，第35頁。

14. 同上，第169頁。

15. 1929年10月31日《澳門報(Jornal de Macau)》。關於此共和派宣傳的背景及《未來報(O Porvir)》，以及索薩·費爾南德斯議員的角色，參閱《索薩·費爾南德斯》，新法馬利康鎮市市政廳出版，1988年，第534頁。

澳門的年代

由新法馬利康鎮(Vila Nova de Famalicão)到隱沒於中國南方廣袤大地的澳門是文第士的旅程。

現在我們聽聽作者敘述他的經歷：“1901年年初，我正在新法馬利康鎮自己的寫字樓起草一申請書，出乎意料地收到一封電報：‘澳門中學教師出缺回覆宜以電報桑托斯·維埃加斯(Santos Viegas)(簽名)。”我讀了一遍又一遍，立刻往對面診所找我的醫生朋友。

——請看這電文。—恭喜！—我沒有要求過職位，而現在不知去還是不去好。

——這是怎麼回事情？

——你聽我說。確實是數月前，我往聖蒂亞戈斯·達·安塔斯(São Tiago d’Antas)探訪桑托斯·維埃加斯蒙席時，他對我說：我的朋友，你這裏不好；你的共和主義只會害你，這裏嗎，是改革黨或進步黨的地方；共和國若降臨葡萄牙，那也是一個世紀後了……我的朋友，為何不到海外闖一闖！那裏你可以謀個職位，潛心研究，這才是你的秉性。

——你怎樣回答了？

——我向他回答說不去流放之地——氣候怡人而且待遇良好的地方可以一去；這裏的收入足以過活，實不宜去黑人的地方謀生。但我的朋友請告訴我：澳門，澳門在中國那邊，亂得如同地獄之地，是不是？……

——我也只知道這些……我們看看我30年前讀過的地理課本怎麼說吧，是的，澳門應該還在同一位置……”¹⁶。

本來可能是一次普通的出差，竟然轉眼間變為了終生長居。

與眾議院議長桑托斯·維埃加斯蒙席和政治家及未來的共和國總統貝納迪諾·馬沙多(Bernardino Machado)的友誼是使他作出徹底改變其一生的決定的決定性因素。

他對澳門及東方的認識總體上而言是十分，十分模糊的：“我承認，華人給我留下了極差的印象。我以為他們不是這樣的。我從未見過一個

16. 1929年10月31日《澳門報》第78號。

真的華人。但我卻熟悉他們：我是從火柴盒上及波瓦德瓦爾津(Póvoa de Varzim)華人咖啡廳那裏熟悉他們的。這個咖啡廳(我在那裏損失了足足6個英鎊)一色中國家具！桌、椅、沙發、護牆瓷磚上鑲嵌著骨和珍珠母的飾品，上面劃著寺廟，睡袍上的留著辮子的華人，臉蛋通紅的華女，優美可愛，身材嬌小，嫵媚動人，彬彬有禮，身著綉花絲綢棉襖，真漂亮……這便是我腦海中的華男華女。”¹⁷

留在他身後的是一個處於共和國前夕的葡萄牙，社會、政治極端動蕩。這是已預見的王權政體的末日。

1901年¹⁸，他抵達澳門時，中華帝國也在苟延殘喘，義和團事變震撼了中國古老封建的結構，這一事變針對着西方，對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籠統地排外仇外。基督教首當其衝，因為通過教義，西方的精神滲透到了人們的心理和文化。此外，從1898年起，中國改良運動日益艱難，康、梁激進黨及文、章保皇黨之間的內鬥不可收拾，慈禧太后利用這個時機發動了後果嚴重的宮廷政變。

1902年，文第士在一次廣州之行中記錄了如下景象：“記得我在廣州城中親眼目睹了一些特別大膽的行動，宣傳者站在街頭的凳子上煽動群眾參加革命，捕殺官吏，然後大肆宣傳所出售的靈丹妙藥，而警察卻在遠處觀望。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時代，無疑，我目睹的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千百人頭落地，可後繼者如潮。”¹⁹

殖民列強如德國，法國，英國，還有俄國和美國佔領了北京。除了強迫滿清繳交巨大賠款外，還獲得了利益均沾。這些恥辱卻加速了立憲及共和運動。1911年，孫中山醫生宣佈成立中華民國。1912年正式成立，立都南京，他出任臨時大總統。

毫無疑問，中國帝國政權在崩潰瓦解²⁰，瓦解的因由源自最後一個王朝在國際大家庭中糟糕及反動的外交政策。

17. 1929年11月29日《澳門報》。

18. 總督是高士德(José Maria de Sousa Horta e Costa)第二任，主教是嘉惠勞(D. José Manuel de Carvalho)，市政廳主席是巴士度(António Joaquim Basto)。

19. 《澳門：印象與回憶》，1979年，第119頁。

20. 徐中約(Immanuel C.Y. Hsu)，《近代中國的產生》，牛津大學出版社，1987；謝和耐(Jacques Gernet)，《中國文明史》，劍橋大學出版社，1986年；符虎(譯音Fu Hu)，《清廷的傳說》，海風出版社，1990年。

在國內方面，可以回顧一下文第士這段有趣的分析：“在中國，人民有時可以反抗政府但是亦受政府管制；是人民安排，選擇，組合，組織，操作自己的生活。國家，中央政府如同寄生於民的蔓草，常常以當權者或爭權者之間的勾心鬥角擾亂人民的安寧²¹……中國人民有驢的哲學……千百年來時不時踢上老闆一蹶子；但沉重的負擔卻無法從脊背上擺脫。這一驢的哲學是中國全部政治史的總結。”²²

葡萄牙人企圖利用中國機構的衰弱，通過一妥善換文的條約來鞏固澳門的自治及對其的承認。這一企圖部分得以實現，因為存在一些微妙的歷史問題。對此，雙方有著不同法律和政治價值的解釋。

文第士遇到的澳門是一個處於明顯民族特徵的殖民地，不見得具有參與傳統的輿論，存在伴隨衰弱的經濟而生的嚴重缺欠基礎設施的問題。

通過文字，以其榜樣與行動，他要扭轉一些局面。一方面，促進其同時代人理念的形成，另一方面，提高建設性批評的社會威望。

文第士是澳城公民的化身。從最原始的意義而言，澳城是一個城邦。

他積極、不懈地捍衛澳門的葡萄牙認同及形成反差的巨大的中國影響。早在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之前，他便通過他作為出版家，教員及公眾人物的明確而長久的活動揭露了對其它文化的無視。

早在1909年，他便指出：“前幾年仍然是具有求知欲的人談論的題目的東方學，如今由於東西方關係，主要是經濟及政治關係的接近，已進入普遍文化的範疇。”²³

路向是放棄統觀的視野而注重綜合的真正認識論的細節。的確可以說是《澳城論》獨樹一幟，時而呼籲，時而斷言，如同巴爾特的風格。出現了一種關於社會及城市結構的新語言。同時欲將建築文物變為文獻。在此，建築文物取米格爾·富科(Michel Foucault)認識論的意義。

在他對澳門的看法中，有許多自白，鬥爭與溝通的敏感。他的看法，他的道德及公民立場反映了他在這樣一個由兩種特異的文化——葡中文化構成的省分小城中所公開表現的激昂鬥志。

21. 1920年6月13日《澳門人報》。

22. 1920年4月11日《澳門人報》。

23. 《老子及其道德經》，澳門，1909年，第61頁。

對於澳城民族特色的消失，他曾高聲疾呼：“約30年前，我第一次來到澳門時，城市不是今天這個模樣。是另一種感覺，更好，饒有特性，一半華風濃厚，其餘葡韻十足。”²⁴ 他進一步回憶說：“我們在此看到了其他人夢寐以求的東西，是我們從未看到過的。這些東西說明了我們的本質，不折不扣地是我們的本質，顯示我們在東方這個地方長期而頑強的生存，正可以表現我們的秉性、生活、歷史。可惜我們是自己的掘墓人，更糟糕的是我們還把這個行當傳給了與我們朝夕相處的華人。我深知澳門從來不是佛羅倫薩，在建築美麗上也無法與北京或杭州相比，但它曾具有濃厚的葡、中特色。可一切，幾乎一切為我們所摧毀……自掘墳墓！我記得整個南灣、水坑尾街、白馬行街、板樟堂街、市政廳、大堂及至媽閣的其他地方一色葡萄牙的風格。今天變成甚麼了？……建築風格混雜，毫無特色，粗俗。以前大班起造的綫條清秀、壯觀，有時裝飾十分藝術的中式別墅一幢又一幢，就算香港、上海也望塵莫及。王璞(譯音 Wong Pu)裝飾過幾座別墅，到了今天所剩無幾，隱沒在周圍毫無特色的大廈的陰影之中。在這對歷史、美學、優雅的摧殘中只有佛寺倖存。”²⁵

他在澳門持一種批判的目光。澳門的確是他所選擇的第二祖國，因此他對中國文化，尤其是藝術，宗教及哲學有濃厚的興趣並學有所精。

在同中國文化的長期接觸中，他具有了新的思想境界。這對其以後的公民及政治活動起到了決定作用。

他的粵語講得還算流利，但識字不多。考慮到他是一個在澳門居住的葡人，借助英語他結交了一批不一般的朋友：為其關於道學著作作序的前廣東省長陳席儒，前國務總理、駐華盛頓大使唐紹儀；前粵督軍陳明；前駐布魯塞爾及倫敦大使和鹽運使劉玉侖(譯音 Lau Yok Lon)，江西官員，“秀才”劉吉樂(譯音 Lau Kat Loc)及澳門竹林寺“大法師”石金生(譯音 Sek Kin Seng)。

知識、美學、宗教及哲學上的共同志趣使這些在澳門寓居的人意氣相投，儘管他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澳門以外渡過的，竹林寺是這批朋友的聚會之所。

24. 1929年6月8日《澳門報》。

1202 25. 同上。

1910年10月5日葡萄牙成立共和國以後的民主傳統並未在澳門的政治及行政組織中生根。專制及個人化的權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華人工商資產階級的支持，很少接受批評、異議，甚至連形式上的不同也拒絕。

特瑞修(Montalto de Jesus)曾嘗試之。他的著作²⁶遭到葡萄牙當局的查禁，被當眾焚毀。這無異於20世紀的中世紀火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第士的遭遇幾乎相同。他逝世後，由於親澳門天主教教會份子的命令，他的一部還在印刷所的著作遭到摧毀。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看，這是一個令人嘆息的態度。

政治及宗教的不容是多元文化及積極批評自由的大敵。

因此，他的任何公民及政治立場從未得到過善待。文第士說“在澳門無名副其實的輿論，亦無公民，確切地說，社會對公眾利益大不感興趣，無思想傳播。就此而言，澳門是一潭死水。”²⁷

文第士所言甚是。1915年，他曾受到其私友，當時的共和國總統貝納迪諾·馬沙多的邀請出任澳門總督。他簡單回答說無任何政治抱負，教書、當律師感覺很好。在這些職務上，可堂堂正正地為國服務。

文第士認為，在時代及進步的激流中，對整個或幾乎自整個葡萄牙在澳門歷史記憶的忽視是不可饒恕的，也許可以說是犯罪。他認為這是政府軟弱所致：“我們葡萄牙人從來不擅經營。我們是優秀的發現者，我們打敗了黑人、摩爾人及東印度人，可我們的管理一場糊塗。”²⁸

然而，全賴澳門，“歐洲及美洲才得以開始同廣闊的中華帝國進行貿易”²⁹，理應承認，澳門歷史及葡中雙邊關係的資料和一切可以用來重建這一豐富歷史過程的最重要的資料，正是保存在無情的歲月和人們草率的行動中。

不幸的是這不是事實。文第士不無苦楚地說：“對澳門本身歷史我們幾乎一無所知，葡語中從未寫過，用來寫澳門歷史的文獻幾乎全部消失了。

26. 《歷史上的澳門》，1926年。1990年二版。

27. 1920年6月20日《澳門人報》。

28. 1920年7月11日《澳門人報》。

29. 1909年5月9日《新生報》。

出於疏忽，由於不可抗拒的時光及蛀蟲，大部分蕩然無存。……澳門歷史的某些方面從未有任何涉及，從未進行搜集，從未系統存檔，從未刻意保護偶存之物。這樣我們步入了20世紀，我們是開創人，卻仍未有一部歐洲在亞洲偉大社會事業的書面歷史……這一忽視，即使不是不可理解，卻使我們在外國人面前相形見绌，因為我們理應擁有比他們更多的撰寫歐洲在華史的數據、資料及文獻。”³⁰

這是1919年的情況，於今仍然令人痛心疾首。

這不僅是一個政體的結構缺陷的表現，更是一個永恆的問題，一個心理的問題。心理是在家庭生活、教育及培養，尤其是在要求社會及使團參與的鬥爭中形成的。

的確，澳門企圖追隨香港。它以前是一個繁榮的商埠，一塊英國殖民地。許多葡萄牙人及澳門人與香港的出現息息相關。這一移民不僅導致了能人賢士的出走，而且導致了不同小集團之間形成的價值危機，對此奧斯汀·考特(Austin Coates)有很好的觀察³¹。

失去了往昔的輝煌，澳門成為了一塊熱情待人的葡中之地，東西方之間最古老的感情紐帶。與宗主國的距離，狹小的區域及無自己收入的情況造成了經濟——金融上的必然依賴。這不可避免使得政府將澳門視為葡萄牙帝國中的一個感情點。只有在政策方面保持了其他殖民地的一般特徵。

文第士對此明若觀火。對於單調枯澀的政治宣傳，他還之以對現實問題的準確而理智的分析論據，提出可行的解決辦法³²。

他對政府所犯下的錯誤毫不留情，因為他是一個積極關注解決他第二祖國問題的公民：“我們在澳門已居住了近20年，對當地政府及居民為繁榮本殖民地而展開的思想運動相隨不離”³³，或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在

30. 1919年11月23日《澳門人報》。

31. 《澳門及英人》，牛津大學出版社，1988年及《澳門的故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78年。

32. 《新生報·印花稅法小議》，1910年3月13日-6月10日；《新生報·澳門經濟研究》，1909年9月26日-1910年1月9日；《澳門人報·澳門貨幣問題》，1919年8月31日；《澳門人報·澳門港口工程》1920年8月22-10月3日。

1204 33. 1920年8月22日《澳門人報》。

後退。本殖民地有其自己的立法，簡單、經濟、便捷，許多年來運作尚佳。……其程序法部分為中世紀的立法所代替，充滿了陳規俗套，令訴訟者費盡錢財與耐性。”³⁴

從1901年至1931年，文第士看到如走馬燈般地換了15個總督。每人有不同的執政風格與心中所急。

他對“於今生活正常發展不可缺乏的救命板——民主”獨有鍾情。³⁵

道學

除了散見於報刊的大量文章外，文第士出版了兩部關於道學的著作。

第一部題為《老子及其道德經》，日期是1909年。其基礎是在陸軍俱樂部中發表的一篇演講。

它明確而系統地闡述了道家的哲學與宗教並回顧了它的歷史及政治文化背景。正是在此方面顯示了他的學術更新工作，他引用了當時最重要的法、英漢學家的著作。其作可被視為欲研究此問題者的可靠指南。

第二部作品《道學選萃》以老子的《道德經》和莊子的《南華經》為藍本，刊於1930年。僅出版了第一部分。這是一部標新立異的著作，反映了作者成熟的思想。

在廣東省前省長陳席儒的序言中，我們可以讀到如下的語句：“文君與余相交多年。君研究吾國文史哲藝持之以恆。自京師以還，與君促膝長談。中華變化萬千，西方思想日烈；君與余同嘆遠古華風為之而失。同感於此，文君始以華夏文化之一面——道學介紹其同胞。始祖老子聖心之人。娓娓教導，醫盲治聾，勸人從善，培育良材。西方之人亦可得益良多。在下不才，以文賀文君之大作。”³⁶

文第士邀請讀者來“解讀”他對道家的個人理解，闡述了這一哲學流派精髓思想的各個方面。

34. 1909年9月19日《新生報》。

35. 1919年6月29日《澳門人報》。

36. 《道學選萃》，前言，第3頁。

這一以詩歌形式所作的反思很好地體現了道家的精髓(詩歌譯文參照葡文版本的句子結構)：

“生與死

為何對生如此執著，

對死如此恐懼！？無人

對好壞人生

有所評判或感覺(內心世界，

肯定有之，然而

無一絲存在)同樣無人

能確切預言未來，人生

多麼不幸。無人。緊閉的

棺材，智慧的光芒

不會再直接射入。泥土的氣息，

現實生活，遠非僅是

安逸，日常經驗

歷歷在目；死亡門欄

遲早人人涉足，

無人能免。

死亡，人生的本質。

逝者如斯夫；

如今時光今生唯一的回憶。

死亡帶來了另一忘卻，

一種完全的解脫。然後，前行，

1206 誰知道！？新生，人生路途上新階段

或立刻
不存在的旅途。未來的精密科學
我們不擁有。安息時，
然而，完美之際，規律命令
一切前行。而後，死神又帶走了一切，
不是帶往可怕的虛無，不是黑暗，
而是帶向光明，更幸福的命運。
智者熱愛生命，但無眷戀
死亡降臨同樣熱愛，
平靜、從容，對道的賜予
毫無畏懼，毫無盲戀。

昔日美麗的齊失魄回故園，
曾為李哭泣。
她為宮中公爵拋棄，
哭容已變為甜蜜的微笑。

死亡莫非如此？
一灘死灰；
但精神，這生命之火，
它，如同生命，無窮無盡。”³⁷

在空想主義的泛神論或佛家的虛無之間，這一困惑的形而上學似乎集中體現在下面的哲理中：

“智者將萬物

37. 同上，第31-32頁。

視為元一。

萬物的和諧中一切為一：

反差，不同，分歧，

是與否，正義與非正義，善與惡，

無異於簡單的領悟。”³⁸

只有同中國哲學大師理論的完全認同，才使得他作出了這關於道家精髓的新異而深刻的領悟。文第士不僅僅公開承認是道家的追隨者，而且活出其中的道德操守和性情。

在他關於中國藝術，尤其是繪畫，陶器及建築的論著中，不時可以看到他作為評論家或史家的目光裏流出道家影響的光芒。

中學教師

文第士在利宵中學中的職務是葡語及拉丁語教師。1904年至1907年間及1909年至1914年間兩次出任校長。

當他於1901年抵達澳門時，葡人社團內部的一場關於進化論和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大辯論³⁹的餘波已平息。在澳門，葡人社團內的教科書出版一片暗淡⁴⁰，一本新托馬斯式的哲學書卻一枝獨秀⁴¹。

38. 同上，第42頁。

39. 弗朗西斯科·沙維爾·龍定那(Francisco Xavier Rondina)，《我主耶穌基督的神聖性—兼駁勒南》，澳門，1864年；安東尼奧·瓦斯孔塞羅斯(António Vasconcelos)，《1881年3月6日第一個四旬齋主日在澳門大堂的佈道，駁斥達爾文體系關於人類及天主教的某些觀點》，澳門，1881年；比厘喇馬忌士(Lourenço Pereira Marques)，《達爾文主義的價值》，香港，1882年；比厘喇馬忌士，《捍衛達爾文主義：駁斥天主教記錄報上一文》，香港，1889年。

40. 至1901年僅有兩本教科書：安東尼奧·洛佩斯·佩雷拉(António Lopes Pereira)，《澳門修院學生用葡萄牙歷史地理課本》，澳門，1865年；卡洛斯·維森特·羅查(Carlos Vicente Rocha)，《算數全書》，澳門，1896年。

41. 弗朗西斯科·沙維爾·龍定那，《在華葡萄牙青年用理論及實踐哲學課本》，澳門，1869年-1870年，2卷。

在教育組織方面，崗頂男小學，王家聖約瑟修院，商專及利宵中學以葡語教學。華人社團則可任意創辦、管理自己的學校。

1914年，澳門的教育“比宗主國的教育先進得多，儘管混雜了一些家庭本質上的分離和負面的因素。這些因素只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抵消或至少無助於教學工作。葡萄牙的教育特色是保守和淳樸的，在某些方面上剝奪了一個優秀教學制度應該提供的效果。的確，在澳門無文盲，僅僅完成基礎小學教育的人只佔少數，一般人的水平接近小學補充課程的水準，完成或幾乎完成中學教育者不乏其人。”⁴²

他對澳門葡萄牙學制的混亂與組織的評論，驚人地體現在1915發表在澳門《進步報》上的一篇文章中。鑒於其重要性，我們附錄全文。值得補充的是，澳門葡語教育的脫節與不統一直至1969年才得到解決……

對澳門的葡語教學，文第士曾評論說：“此地無思想的社會交流，共同相處未超出家庭的範圍。在所有地方，這裡的語言功能最小，因為它狹窄，封閉，環境單調，家庭化。需要交談，換換環境，有話要說和要聽取別人意見的人要出外，上街，去聚會的場所，總之去有其他人的地方。而這正是此處所缺的東西。此地巴掌大；可以交談的熟人是那些沒有甚麼可談的親戚。不是親戚，便是意氣相投者，老生常談。一人知，眾人知。因此為了不找其它消遣，時刻不離合花(譯音vafá)——這玩意。

只有環境複雜，才可能獲得廣泛的詞彙：眾多的人口，不同的階級，不同的職業，多樣的動植物，社會，政治，藝術衝突等等。無這樣的環境，永遠是那一套，老生常談，思想僵硬，語言單調，無新意。由此而論，澳門是一潭死水……”⁴³

文第士的學生若阿金·帕索·德·阿爾克斯(Joaquim Paço D’Arcos)⁴⁴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個令人難忘的回憶“教授葡語和拉丁語並兼法語課的文第士老師是個瓷器及中國藝術品的大收藏家。他一生的收藏足以開設一個真

42. 1914年10月8日《進步報》載〈澳門的第九次公共教育改革〉。

43. 1920年7月11日《澳門人報》。

44. 若阿金·帕索·德·阿爾克斯(1908-1979)，詩人，小說家及散文家，作品豐富，許多譯為外語。

正的博物館。其內容之豐富可與庇山耶（Camilo Pessanha）的藏品媲美。老師對世俗藝術的知識比那位大詩人的知識更加紮實。他教書又是執業律師，是一個聞名遐邇的大律師。同時，又是作家，留下了法律，文學及解釋中國哲學的著作。他1898年畢業於科英布拉（學士學位 licenciatura），22歲時便出版了第一部書。這是以自由體詩翻譯的席勒的《威廉·退而（Guilherme Tell）》，他還作了序言，加了註釋。居澳30年期間（1901-1931），他為報刊撰寫了大量文章。他本人也長眠於澳城。……他那寶貴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幸得保護，成為今天澳門賈梅士博物館中最重要的展品。”⁴⁵

文第士：生平書目介紹

文第士於1876年11月30日出生於波爾圖縣聖梯爾所區（Concelho de S. Tirso）的聖米格爾·達斯·阿維斯（S. Miguel das Aves）。其母羅薩·達·席爾瓦·皮涅羅（Rosa da Silva Pinheiro），其父若澤·達·席爾瓦·門得斯（José da Silva Mendes）。

科英布拉大學法律學士，曾為在葡萄牙設立共和制度展開過積極的活動。

1901年5月27日起出任利宵中學葡語及拉丁語教員。

曾擔任數個重要職務，市政廳主席，民政廳廳長，校長，法官及檢察官。

曾為開業大律師，聞名遐邇。

中國藝術收藏家及專家。被認為是第一個研究老子的葡萄牙人。他的公民及文化活動給當時的澳門社會留下了深刻的痕跡，經常為報刊《新生報（Vida Nova）》、《澳門人（O Macaense）》、《進步報（O Progresso）》、《祖國（A Pátria）》、《澳門報（Jornal de Macau）》、《澳門之聲（A Voz de Macau）》、《東方雜誌（Oriente）》及《澳門雜誌（Revista de Macau）》撰稿。

45. 若阿金·帕索·德·阿爾克斯，《生平與時代回憶錄》，基馬良士出版社，無出版日期，第1卷，第218-219頁。

1931年12月30日於澳門逝世，並且在澳門有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文第士街始於二龍喉馬路，至於東望洋街)。

已刊論著

《自由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1896年

席勒，《威廉·退而》，翻譯，序言及註釋，1898年

《法律反思》，1907年

《老子及其道德經理論》，1908年

《道學選萃》，1930年

身後他人整理出版的文集

《文第士文選》，高美士編，3卷，1949年。

《文第士新文選》，高美士編，4卷，1963-1964年。

《澳門：印象與回憶》，白妲麗(Graciete Batalha)編輯並序，1979年。

《論哲學》，1979年

《論藝術》，江連浩(António Conceição Junior)，編輯並序，1983年。

《澳門的公共教育》，安文哲編輯並序，1996年

有關文第士的論文

文德泉(Manuel Teixeira)蒙席，《利宵中學·文第士》，教育司署，第3版，1986年，第420-430頁。

安文哲，《文化雜誌·自由社會主義史家文第士》，第15期，1991年7-9月，第144-150頁。

若澤·德·卡爾瓦略·雷戈(José de Carvalho e Rêgo)，《昔日名人》，澳門文化學會，1994年，第345-348頁。

附錄

學校多，組織少⁴⁶

沒有人敢說可供澳門非華人人人口就讀的學校不多。學校太多了、有崗頂男小學、有女學堂、有聖羅撒學校、有澳門振興學會的商專。還有包括小學、中學、商業課程、漢語及神學的聖約瑟修院和利宵中學所附設的商業課程及漢語班，此外在政府華務廳有培養翻譯的漢語語言文學班和港務局有駕駛課程。

有人可以說澳門缺乏學校嗎？絕對說不出口！學校太多了。組織好壞則另當別論。我們說學校太多了是因為對不過幾百人的就學人口而言，少些學校便足夠了。

有3間商業學校或稱三個商業課程，但就讀者只有幾十人。一間學校還招不足學生，為何設立3間？

也有3個漢語班。為何3個班？漢語班的學生遠遠少於商業班。商業班不足以開設一間學校，漢語班只要半個老師便夠了。效果如何？效果是沒有幾個人上了漢語班後可以用中文看懂或寫明信片。

有兩個男子中學班級，沒有一個是完整的，也有兩個不完全的女中班。在這樣小的地方，就學人口這麼少，符合自然規律的做法是開設一個班，但要完整。可恰恰相反，有兩個班，兩個班都不全。這是男校的情況。

女生也有兩個不完全的中學班。一個在女學堂，另外一個在聖羅撒學校。無協調，不互為補充，更不相屬。

澳門教育狀況由此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所有這些學校的費用，即使這筆帳很容易算，亦無需去算它。只要僅僅考慮到學生的數目，便可想而知這張大得驚人。

多少老師？多少學監、秘書、書記及助理書記？不必細算，但可大略估計一下，光教師就要30個或更多。我們也不去算這一大堆人的工資，即使用黑人，數目肯定也很高。

1212 46. 刊登於1915年5月30日第39號《進步報》。

秘書、學監、校衛、校長、書記、校工及僕人的工資總額低得多。總之，這一大批人也要吃飯，不是靠其它過活，因此如果開設必要的學校，明顯地其人數可減至三分之一，相應的費用可減少三分之二。

這一切似乎表明，澳門的教育有利於教員及校長而不利於學生。學校太多，人員繁雜，學生稀少。為何不使學校的數目與學生人數成合理比例？

或許會說，這些學校不屬於同一單位，因此無法使其遵守同一經濟及教學計劃。一些學校是政府的，另外一些是市政廳的，還有一些屬於不同協會的。每個單位有權設立自己的學校。

的確如此，事事依法而行。但應該看到的真相是，法律並不完全符合實際。為其麼不針對這些法律作出修改？為其麼不協調這些單位，設立必要的學校，配備必要的人員呢？

要共同努力達此目的嗎？可以直言不諱地說，葡萄牙教育中沒有這回事。

每個單位都想擁有自己的學校，即使大家承認由於缺乏條件或其他的原因，學校辦得不好，可是無人願意談起合併資金或條件來共同辦校，我們的教育沒有共同辦校的基礎。

另外明顯的一點是：用國家、市政廳、修院、澳門振興學會和聖羅撒學校的錢可以少辦些學校，但辦好學校。今天所有澳門學校的校址不能算是教學大樓，而是教學破樓。家具，教材不足且質量極其低劣。

合併資金，把所有的單位集中由一個領導層來管理，教育工作不是更有實效，更經濟嗎？我們深以為然。

儘管提出了許多教育改革的建議，從1893年至今未有一個獲得接受。這些觀點亦未得到考慮。只要這個事實繼續存在，我們認為，本殖民地的教育問題不會得到全面的解決。